



浙商 简史

从启蒙传承到超越

ZHESHANG
JIANSHI

杨轶清 著

浙商 简史

从启蒙传承到超越

ZHESHANG
JIANSHI

杨轶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商简史:从启蒙传承到超越 / 杨铁清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13-05914-8

I. ①浙… II. ①杨… III. ①商业史—浙江省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950 号

浙商简史:从启蒙传承到超越

作 者: 杨铁清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李 雯

责任校对: 朱晓阳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7 万

插 页: 1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914-8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浙江经济的人格化解读

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乃是“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集成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天地人”三因素之中,“天时”对不同区域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地利与人和”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显著。“地利”和“人和”之间又相互作用,地理人文因素对不同地域环境常住民文化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形成影响持久。因此,从人的因素,特别是经济活动主要群体工商业人士,梳理区域经济的形成过程和内涵特征,是一个易于深入和展开的角度。

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较为突出。被视为中华商祖的范蠡,其事业的起点以及主要舞台在古越浙江。越王勾践能够兴越灭吴,其国力强盛的基础即来自于范蠡“农商兼备”的战略思想和实践;元末明初传奇巨商沈万三年少时离开故乡南浔闯天下;晚清首富胡雪岩终生以杭州为其事业根据地;南浔商人“四象八牛”富可敌国;宁波商帮更是群星璀璨,影响力至今不衰。

浙江工商业活动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唐朝时即有宁波人远赴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康熙年间即有义乌人(义

乌兵)寓外经商的记载;分别来自一镇、一县和一郡(府)的南浔商帮、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称雄海内;明清时期浙江本土学者“工商皆本”的事功学说深刻影响了中国商业文明。

所以,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无论是工商业活动、商业思想,还是名商巨贾,浙江皆走在全国前列或具有典型性。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浙商崛起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的源头活水和历史必然。

浙商是四维一体的复合式概念: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既在本地创业,更活跃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既有历史渊源,更在改革开放后崛起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群体。所以,浙商史有别于浙江经济史。

《浙商简史》的研究和撰写以人物为主线,以人带事,人事交融,点面结合。以人物活动表现时代背景,反映当时普遍或特定经济活动。因此,《浙商简史》既不是传统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别于一般人物传记的体例。而对浙商的观察和研究又分为三个维度:浙江的商人、工商业活动和商业思想文化,厘清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浙江经济的文化特别是人文源流。本书对应的时间跨度也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古代部分(辛亥革命之前)、近现代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和当代部分(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

《浙商简史》是一次对浙江经济史的人格化解读,通过对浙商历史的梳理,厘清浙商文化和浙商精神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为解释浙江经济和浙商发展的成因、特征包括优劣势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考。

目 录

MULU

前 言	浙江经济的人格化解读	1
第一章	浙商的历史源流概述	
第一节	公元前 6 世纪至 6 世纪: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高峰	2
第二节	公元 6 世纪至 10 世纪:海外民间贸易和私人自主贸易在浙江兴起	4
第三节	公元 10 世纪至 14 世纪:都市集镇商业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	6
第四节	古代浙商的生产和贸易: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	7
第五节	公元 14 世纪至 19 世纪:浙江工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崛起	9
第六节	19 世纪末以来近现代浙商的曲折发展	13
第七节	当代浙商的崛起和浙商品牌的初步形成	14
第二章	浙商远祖范蠡:商业启蒙时期的经济思想与实践	
第一节	佯狂待时的楚人范伯	18
第二节	鞠躬尽瘁的越臣范蠡	19
第三节	致费巨万的商圣陶朱公	22
第四节	范蠡的经济思想	23
第五节	范蠡与浙江和浙商的渊源	26

第三章	浙江商业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节 自然地理和人文传统视野里的浙江思想文化	28
	第二节 浙东学派对浙江人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	30
	第三节 浙东学术思想对工商业活动的影响	37
第四章	龙游商帮的崛起和衰落	
	第一节 龙游商帮崛起和式微的时空背景	39
	第二节 龙游商帮的主导产业	41
	第三节 龙游商帮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43
	第四节 龙游商帮的代表人物	45
第五章	与中国近代化同步的南浔商帮	
	第一节 上海开埠成为南浔丝商崛起的契机	47
	第二节 “象牛”成群富可敌国的地域性商团	50
	第三节 贾而好儒成为浔商发展的双刃剑	51
	第四节 内忧外患致使浔商陨落	53
	第五节 南浔“四象”的代表人物	54
第六章	宁波商帮的历史脉络和现代转型	
	第一节 宁波商帮崛起的影响因素	65
	第二节 宁波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68
	第三节 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	77
	第四节 宁波商帮经营的主要行业	90
	第五节 宁波商帮的文化内涵和群体特征	92
	第六节 宁波商帮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95
	第七节 宁波商帮与上海的近代化	95

第八节	宁波商帮的外迁与回归	97
第九节	当代甬商和历史宁波商帮的关系	98

第七章 官系民营商人样本：“红顶首富”胡雪岩

第一节	草根出身,白手起家	99
第二节	依傍左宗棠,经办特权业务	103
第三节	多元化经营,创办国药号	106
第四节	投机失利,内外交困,盛极而衰	108
第五节	胡雪岩败局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110

第八章 民国时期浙商的思想 and 实践

第一节	思想家汤寿潜的实业人生	114
第二节	实业大王刘鸿生的集团化经营	116
第三节	虞洽卿的产融一体实业之路	117
第四节	张静江发展近代工商业的理念与实践	118
第五节	民国浙江实业家工商业活动的特点	122
第六节	首届西湖博览会折射的民国工商业	122
第七节	江浙财团的兴起与衰落	124
第八节	民国时期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困境及其破产	125

第九章 近代浙商在全国的影响:以金融业为例

第一节	从浙江钱庄业到银行业的演变	126
第二节	中国早期银行大多由浙商参与创办或任主管	128
第三节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中坚力量——宁波商帮	130
第四节	清代钱庄业绍兴一派最有势力	132
第五节	浙江地方银行分拆始末	134
第六节	叶揆初、蒋抑卮同心联手执掌浙江兴业银行 30 年	137
第七节	金润泉主持杭州中国银行 40 年	140
第八节	浙江近代金融业部分代表人物	142

第十章	当代浙商的崛起和演变路径	
	第一节 浙商成长阶段的划分依据	147
	第二节 半自主创业阶段(1978年以前)	149
	第三节 自发创业阶段(1978—1988年)	153
	第四节 自觉适应阶段(1988—1998年)	169
	第五节 自由发展阶段(1998年以后)	177
第十一章	当代浙商成长的曲折探索	
	第一节 “挂户经营”创新生产关系瓦解了个人创业的制度束缚	179
	第二节 过渡性产权安排的风险	181
	第三节 “八大王”因“投机倒把罪”被严打	183
	第四节 “八大王”遭全国通缉重创温州个私经济	185
	第五节 “八大王”起伏浓缩浙商创业精神	187
第十二章	当代浙商的突破和成长	
	第一节 章华妹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执照》	190
	第二节 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创办人陈华根	192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人方培林	196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创办人杨嘉兴	201
	第五节 全国首家异地上市公司董事长尹相泉	206
	第六节 中国中小板第一股新和成创办人胡柏藩	209
	第七节 中国A股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创办人孙德良	211
	第八节 国内首家财团法人中瑞财团发起人郑胜涛	214
	第九节 改革开放后非公经济人士当选副省级领导第一人徐冠巨	217
	后 记	224
	参考文献	225

第一章

浙商的历史源流概述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发育较早,拥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古老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浙江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文明,形成了区别于中原重农轻商思想,工商皆本,具有重商倾向的地域性文化价值观。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 130 年前曾对中国进行了 7 次考察。1861 年,他沿着杭州湾曲折优美的海岸线,走遍了浙东沿海。他发现这个省份虽然拥有美丽的西湖、拥有全世界只有巴西亚马孙河的潮涌可与之媲美的钱塘江大潮,却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地处浙东的宁波更甚。在这个号称“宁绍平原”的地方,连土地都少而贫瘠。然而,宁波人勤奋与拼搏的企业家精神却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这样写道:“浙江省人,由多种多样的人组成……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作为外来者和旁观者,李希霍芬的观察可谓精确。从古越国的范蠡、计然到南宋时期全国领先的都市商业,从明代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清末开埠后的商帮摇篮,及至近代民营企业兴衰,浙江人的智慧和勤奋,书写了浓墨重彩的浙江工商业文明史,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义利并重的浙商。

第一节 公元前6世纪至6世纪：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高峰

越人以治水的禹为自己的祖先。古越时期，水患不断，大禹治水虽然只是个神话，但是故事中的大禹尊重自然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浙江精神与之一脉相承，说明浙江精神的渊源自越时期就开始形成并传承。

春秋时期，钱塘江的东南岸建立了浙江历史上第一个部族——于越^①。越王勾践继位后，在与相邻的吴国交战中失利，从吴国获释回来后，他卧薪尝胆，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击败了吴国，成为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强大，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被后世奉为“中华商圣”的范蠡。

范蠡在越为官的时候，曾拜计然为师，制定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他重视农业生产，关注天时气象，还用五行之说总结了农业生产丰歉的一般规律，并根据这个规律未雨绸缪。他十分重视宏观调控，提出平粟论，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范蠡力主发展商品经济，认为让钱币像流水一样周转不息，才是生财富国之道。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范蠡还意识到了商品贵贱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出了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变化而波动的一般规律。

范蠡拥有杰出的商业才能。“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并“三聚三散”。他被后世商家视之为祖师爷。范蠡是中国商人入史第一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列范蠡为第一。范蠡成名在古越浙江^②，其“弃官从商”的人生价值理念及其“仗义疏财、施善乡梓”的财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了浙江人重视实业，以经商致富为

①有时也写作“於越”，古代“於”、“于”通用。但也有研究认为“於越”之“於”发音为“wū”。

②范蠡与浙江渊源深厚，绍兴城由范蠡主持规划设计，而且2500多年来城址未易。如今浙江依然有许多与范蠡有关的地名，绍兴市区古越龙山脚下建有范大夫祠，诸暨建有范蠡祠。

荣,并善待财富。

到了战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已经有了领先于时代的水平。据《越绝书》记载,越人当时已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顺风,去则难从”。而《周书》也有“成王于越献舟”的记载。同时,因为勾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号召越国上下大力发展蚕丝业,并令范蠡和文种两人引进当时丝织业发达的齐国和鲁国的经验和技能,浙江当时的养蚕和丝织技术,浙江当时的养蚕和丝纺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据《加泰会稽志》记载:“穀^①首见于越国。”而人们所熟知的“西施浣纱”的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浙江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派遣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从鄞县入海去蓬莱^②。《后汉书》提到:“会稽海外有东鯷人^③……时至会稽市。”《三国志》也有记载:“其上^④人民,时至会稽货布。”从这些记载都可以看出,当时浙江已经跟海外有了贸易活动。《后汉书》还提到浙江上虞人朱雋“母尝贩缯为业,同郡周规……假郡库钱百万,乃雋窃母缯帛,为规解对”。意思是说朱雋的母亲经营丝绸贸易,被朱雋偷去了价值百万的丝绸,而朱雋还能转手出售为朋友还债。这足以说明当时浙江已经有了繁荣的丝绸贸易市场。



汉朝时宁波被称为“贸邑”(鄞县)

秦始皇设郡县制后,在如今宁波地区正式建立了鄞、鄞和句章三个县。据说,当时海外到宁波来集货贸易的人很多,所以在此设立鄞县。鄞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为贸易的地方。其县治位于今宁波鄞州区。

①音 hú, 绉纱的一种。

②今日本。

③日本人。

④指澶州,中外学者多认为就是日本。

三国时期,浙江地区属东吴管辖。据《松窗梦语》记载:“吴制服而华……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当时,日本与东吴国时有商贸往来。日本的民族服装吴服^①的出现,就是东吴的纺织品及衣服缝制方法传入日本的缘故。

第二节 公元6世纪至10世纪:

海外民间贸易和私人自主贸易在浙江兴起

唐代以前,为了航行安全,中日航路都走北线,即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或者抵达山东半岛后沿海岸线航行至扬州和建康。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七次遣唐使^②到中国,横越东海至扬州、苏州和明州^③。从此,明州就成了遣唐使的主要登陆海港之一。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新罗梗海盜道,更繇明、越州朝贡。”除了明州外,浙江的越州^④、杭州、温州、台州也都是对外的贸易港。著名的东海航路,就是以明州港为主轴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干线。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

唐朝建立后,政治稳定,浙江地区的丝织业继续稳步发展。当时,中国丝织业的中心在北方,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领先于浙江地区。唐初,薛兼训任江南东道节度使,为了提高浙江地区的丝织业水平,他从军中招募了一批未婚男子,每人给了一笔钱,下密令让他们去北方找精通纺织技术的女子成亲。一年后,数百织女被娶回了浙江,进而带动了浙江丝织技术快速发展。这件事在李肇的《国史补》中就有记载。据统计,唐天宝年间,全国贡赋织品最多的就是江南东道,而其中浙江的就占了三分之二。这些丝织品品种繁多,史书形容“薄如蝉翼、飘似云雾”,是唐代海外丝绸贸易中最受各国人民欢迎和喜爱的商品。

除了官方之间的朝贡贸易外,唐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日本仁明

①即和服。和服是西方人对日本吴服的称谓。明治维新后,日本人逐渐接受了这个词,但在日本卖和服的商店,一般还是习惯称之为“吴服”,意为从中国吴地传过去的服饰。

②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然是外交使节,实际上是到唐朝进行变相的官方贸易。

③今浙江宁波。

④今浙江绍兴。

朝中止了遣唐使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当时中国涌现了很多从事海上贸易的大商人，如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他们以船主的身份多次往来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及台州之间^①。其中李邻德在唐会昌二年(842)由明州出发驶往日本，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唐代的明州不但与日本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与新罗(朝鲜)、环王(越南)、尸利佛逝(印度尼西亚)、占卑(苏门答腊)等国的商人通商。此外，还有来杭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他们贩卖中国丝绸，推销本国的特产，并开店列肆聚居在杭州。现在杭州中山中路上的凤凰寺，原名真教寺，就是唐代时一位在杭州的埃及大富商创建的。

到了吴越国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吴越国则偏守一方，社会比较安定。此时，浙江的丝织业已经超越了北方，成为全国之首。同时，政府设立了沿海博易务，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几次派遣大商人为使者，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如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袞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一些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李邻德：唐代宁波商人、赴日贸易第一人

唐会昌二年(842)春，李邻德自明州港驾商船赴日本，这是华人赴日贸易最早的记载。

^①见《中日交通史》，木官泰彦著。

第三节 公元 10 世纪至 14 世纪： 都市集镇商业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

到了宋代，由于朝廷积弱，中国北方先后为辽、西夏和金所占领，政治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人口也随之向东南迁徙。据宋代记述高宗朝时事的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在这些南迁的人口中，有许多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据统计，当时全国分二十多路，但单两浙路所缴纳的丝织品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此外，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丝绸贸易的发展。

宋代国土面积较先前小了很多，国家财政困难，对外贸易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扩大海外市场，两宋政府采取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比唐代更加积极。北宋开国不久，宋太祖就派了内侍八人，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分四路到南海各国邀请外商来我国通商，还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收关税，凡与海外贸易有关者，均由其主管，称为“三司”。这也是浙江丝绸大量外销走向世界的开始。

为防止贸易量过大、流出国境的钱币过多而造成钱荒，南宋继唐代关于钱币输出禁令之后，于公元 1219 年，规定凡买外货须以丝帛、锦绮、瓷器、漆器等进行等价交换。这样一来，浙江生产的丝绸就大量地用于作为购买外国进口商品的“货币”，输出的范围日益扩大、数量也不断增加。由于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两宋时，北方的贸易港都被辽、金所占，宋朝的港口输入、输出中心转移到浙江明州^①。《宋史》记载，公元 1032 年“高丽遣使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宋朝政府准许朝鲜的贡使从明州进京朝贡。此后，明州港同朝鲜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加频繁了。明州港也成为浙江各海港和广州、泉州港航

^①两宋时期，杭州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明州（宁波）则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到了元朝，杭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世界级商业都会之一。

行日本、朝鲜的必经之地。除了官方往来,私商往来贸易也很活跃。据《高丽史》记载,当时去高丽经商的浙江人很多。如公元 1031 年,有台州商人陈惟忠等 64 人;公元 1038 年,有明州、台州商人陈亮、陈绩等 147 人;1049 年有台州商人徐赞等 71 人。而当时浙江商人主要的贸易往来国还是日本。据记载,公元 983 年,日本僧人奝然就是搭乘浙江商人陈仁爽的船来到中国,后来又乘坐商人郑仁德的船回国。

除了海外贸易,由于人口的大量南迁,浙江的市镇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宋代以前,商店只能开在政府规定的“市”内,分肆经营,交易时间仅限于白天,规定“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会,日入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到了南宋,各类商店就移向了街头,甚至还出现了夜市。随着都市商业的发展,行业也开始细分。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京都有四百十四行”,这些“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商业行业,比如金银市;一类是手工行业,大多成为作,如砖瓦作;还有一类是服务性、修补性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称为行会。行会的首领称为行首、行头。行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办理本行人的税收、科索、回买等^①,同时还代表本行业与其他行业进行协商与洽谈业务,与政府进行交涉等,有些行会还设有行人聚会和办公的场所。

第四节 古代浙商的生产和贸易: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载体,起始于东汉时期,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元时期。进入明清时期,“海禁”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式微。浙江省凭借特殊的资源优势,即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

宋元时期,宁波(时称庆元)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朝廷控制了舶商的贸易权。北宋明州为“三司”(广州、杭州、明州)之一,市舶司签发给商舶的“公凭”,不但记录商船主从明州港出运的各类货物,还载明必须遵守的法规。南宋宁波市

^①“科索”指政府摊派,“回买”指低价强买。

舶司属户部管理。元代“三司”更迭为“广州、泉州、庆元”。可见，从北宋、南宋一直到元朝，浙江省（杭州和宁波）在官方对外贸易口岸中占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地位。

公元1085年，朝廷下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引论”。元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下令“并温州舶司入庆元”，来往于温州港的海商也需赴庆元办理进出关手续，庆元市舶司管理海域扩大。成宗大德三年（1299），元政府“并澈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不但庆元的辖区、权利扩大，而且海外贸易被置于朝廷直接控制下。至此，全国港口设立市舶司的只剩下庆元、广州、泉州三处，庆元又取得了宋两浙路市舶司的地位。北宋明州孙忠、朱仁聪商团17人，从熙宁五年（1072）到元丰五年（1082）的10年中（5年侨居日本），先后6次来往于明州与日本之间进行海运贸易；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商团147人与高丽进行海运贸易。据统计，到北宋末55年中，明州商团到高丽经商有文献记载的就达120多次，南宋时明州进口货物有160余种。明州（庆元）海外贸易之盛居两浙路之首^①。

浙江与东南亚的交往也相当频繁。在宋代，明州港与南洋阁婆（爪哇）、占城（越南）、暹罗（泰国）、勃泥（加里曼丹）、三佛齐（苏门答腊）以及大食（波斯）等都有贸易往来。宋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寓居明州，并驻有“波斯团”。城内从宋代开始至清光绪时，尚存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的“波斯巷”，并建有他们信仰的“回回堂”（清真寺）。元代，朝廷派周达观于公元1295年从庆元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带去了庆元著名的草席，翌年返回庆元，著有《真腊风土记》。

进入明朝，朝廷实行“海禁”，明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对外国来华的船只也严加限制，仅允许以朝贡形式来华进行贸易。当时的民间海上贸易实际上是“非法”的走私贸易。明代中期，常有中外商贾万余人、停靠船舶千余艘集结在双屿港内，这里就是一个走私贸易基地。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海上丝绸之路”重新进入繁荣时期。浙商在海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逐渐进入主流社会，得到当地政府和社区的认可。

^①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商船是元代从宁波起航的贸易船，该船行驶到高丽西南岸木浦港不幸沉没。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该沉船进行海底考古，仅铜钱等就发现近30吨。